

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动态

总字88期

2001年12月16日

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土地使用权流动调查报告之十

土地为何向低生产率农户流转 ——评“柳塘调查”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钟笑寒

经济学的次优理论 (the Second-best theorem) 指出：“如果一个或数个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则一般说来，满足余下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理想的。”这个理论运用到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就是提醒我们：局部改革也许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现实的说，如果非要进行局部改革不可，则改革的时序非常重要。在农村改革中，我们目前的顺序似乎是：劳动力流转在理论上几成共识，实践上也走得最快（虽然城乡壁垒还没有完全消除）；土地流转理论上分歧很大，实践上仍是“小脚走路”；而资本的流转则完全被摒弃，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少讨论。

如果劳动力流转在加速，土地流转也有所发展，而资本流动受到抑制，结果将是怎样？《投资信心与农业投资——浙江省兰溪市赤溪乡柳塘村调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动态84期）（以下简称“柳塘调查”）观察到的现象是：土地有可能向低生产率农户流转，导致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果这成为普遍情况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在有限的土地上、利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而且是低生产率的劳动力）生产出的农产品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将有可能面临衰退的危险！

一、 土地向低生产率农户流转：一个理论分析

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将事情看个究竟。假定原来完全封闭的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所有劳动力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表现为二者的价格）相等。随着劳动力流转机制的建立，农村的劳动力出现分化。考虑两种劳动力——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高生产率劳动力，就是那些年轻力壮、文化程度相对高（初中以上）、处在经济比较发达和活跃地区的农户，可以在农业生产以外获得一个比较高的生产率和预期工资，这反过来成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时必须考虑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不下降的情况下，由于他们所要求的工资率上升，也会导致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下降，以及更进一步的，对土地要素的需求下降（参见文末数学附录）。而低生产率劳动力，由于认为自己无法在农业以外谋生（或许已经受过某种挫折），其预期工资没有提高，对农业生产的激励也没有改变。

此时，如果土地的流转和撂荒是禁止的（劳动力流转受阻的情况也具有类似的影响），不管哪一类农户，都不得进行耕种（以避免某种惩罚），农业产量可以相对稳定。如果情况相反，土地可以进行流转，但存在流转的限制——不能改变用途，只能在村内农户之间流转等。那么，高生产率劳动力对土地需求的下降，而低生产率劳动力对土地的需求不变，又无法引入新的土地需求，则在土地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带动整个村的“土地市场”的均衡价格下降（正如“柳塘调查”所观察到的，土地租金极低）。土地租金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刺激了那些低生产率的、只能从事农业的农户为追求农业生产的利润而租入土地，扩大生产。低生产率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劳均产量）将有所提高，但不会高过高生产率劳动力（否则高生产率劳动力会回来种地）；而土地生产率则进一步下降（这也反映为土地价格下降）。在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的情况下，这将导致农产品总产出的下降！

二、 引入资本才能提高农业产出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资本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和土地的规模报酬递减，劳动力和土地的流转只能导致农业产出下降。解决的办法是显然的：必须引入资本。既然土地和劳动的农业回报都很低，说明劳动力和土地是相对过剩的，而唯有那个被固定了不能改变的资本可能是稀缺的。实践证明正是如此（这正是笔者“蓝田调查”所阐明的事实和观点，参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动态68期）。资本的引入可以刺激技术引入和市场的开发，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大大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及其回报，缓解高生产率劳动力外流的局面，甚至带来规模效应。农业的效益因此才能提高。虽然“柳塘调查”的作者认为树立农户自身的投资信心是问题的关

键，而这又要求政府的支持、金融体系的改进等（资本的可获得性是导致柳塘村还有少量土地流向高生产率农户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引入大资本（农业企业）进行产业化开发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办法，甚至是更好的办法。相反，如果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不能解决资本引入的问题，那么也不能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題。日本农业固然得益于农协制度，但也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持。

三、 结论

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现在的思路来进行农村改革，在劳动力流转上不遗余力，在土地流转上步伐加快（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而忽视了在农业生产中引入资本的理论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对农业企业扶持等政策问题，那么，若干年后的中国农村将是什么状况？也许到那时，高素质的劳动力已完全离开农村，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加上资本缺乏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乏力、风险抵抗能力下降，导致农业产出的严重下降，土地的低效率利用甚至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更何况WTO的外部冲击。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们何言以对？

【数学附录】

考虑一个并不特殊的情形，即：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表示为：

$y = AE^\alpha L^\beta K^\gamma$ ，其中：E,L,K分别代表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y代表产出。

1、资本抑制下的劳动力和土地流转

假定资本不能改变（ $K = \bar{K}$ ），则生产函数变成：

$y = A_1 E^\alpha L^\beta$ ，其中 $A_1 = A\bar{K}^\gamma$ 为常数，

有理由假定土地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减（ $\alpha + \beta < 1$ ），容易求得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需求函数：

$$E(r, w, p) = \left(\frac{p\alpha}{r} \right)^{\frac{1-\beta}{1-\alpha-\beta}} \left(\frac{p\beta}{w} \right)^{\frac{\beta}{1-\alpha-\beta}}, \quad L(r, w, p) = \left(\frac{p\alpha}{r} \right)^{\frac{\alpha}{1-\alpha-\beta}} \left(\frac{p\beta}{w} \right)^{\frac{1-\alpha}{1-\alpha-\beta}}$$

其中：r为土地租金，w为工资，p为农产品价格。

可以看出，即使农产品价格p不变，对于高生产率农户，如果工资率（机会成本）w上升，他对土地和劳动的需求量都会下降。进一步，如果这种情况导致了土地价格r下降，那么低生产率农户的土地需求会上升。

2、资本放松下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流动

如果通过改进农村金融体系、政府支持或者大企业进入，导致资本K上升，则劳动和土地的边际产出一定上升，因此其边际回报增加。特别的，如果资本介入引起了规模报酬递增（ $\alpha + \beta + \gamma > 1$ ），则农业产出y会提高，而土地和劳动的总回报也会上升。

（版权所有，转载、转摘请与本中心联系）

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楼302

联系电话：（010）62789695
邮 编：100084

[返回](#)